

書評：

艾威《魚目揀珠：歐陽竟無與學院派佛學的復興》*

俎曉敏 Jessica Xiaomin Zu

(美) 南加州大學多恩西夫學院

(Dornsife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紀贇 (新加坡佛學院) 譯

艾威 (Eyal Aviv) 的這本專著是英文學術界第一本專門研究現代中國法相唯識宗的著作。現代法相唯識復興運動影響深遠，故被若干學者稱為 20 世紀中國佛教變革具有決定意義的敘事¹，也是現代佛教“最引人入勝的發展”，並且是“現代中國思想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²。艾威的這本專著重點介紹了這場運動領軍人物歐陽竟無的生平和事業，他可以說是這場運動中最傑出的、但也是最富爭議的領袖。歐陽竟無不僅以其對法相唯識學 1500 年傳統的全新詮釋吸引了至少一代中國知識份子，也引來了來自僧界領袖、佛學知識份子和理學家的激烈反對。

* 本文原為英文。作者感謝新加坡佛學院的紀贇譯為中文。也感謝應磊教授的協助。

¹ 見 Wing-tsit Chan,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93.

² 見 Bing Chen, “Reflections on the Revival of Yogācāra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Foundation for Yoga Practitioners: The Buddhist Yogācārabhūmi Treatise and Its Adaptation in India, East Asia, and Tibet*, ed. Ulrich Timme Kragh, 1054-107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艾威的專著不僅豐富了日益增長的現代法相唯識研究領域，還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兩次及時的介入。首先，它摒棄了迄今為止主導現代佛教研究的世俗化範式 (secularization paradigm)。它沒有通過西方的唯心主義 (idealism)、反現實主義 (anti-realism)、心理學或胡塞爾現象學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的視角來看待法相唯識學³，艾威審慎地分析了歐陽竟無和他的對話者的自身關注點、願望和知識背景。艾威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即“真實性” (authenticity)，它不容易被歸類，並跨越了政治、社會和宗教領域的界限。與世俗化範式下的常見話語相比，如將宗教納入私人的和心理的範疇的話語，艾威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歐陽竟無是如何設計出一種“真實性”話語，既作為個人生存問題的解決方案，又作為“新中國精神的解決方案” (第2頁)。一方面，艾威的新分析視角進一步揭示了世俗化話語的局限性，它往往忽略了現代佛教的新穎“治世技術” (socio-techniques)。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佛教的信仰實踐如何通過展望新的來世，從而正面構築起一種同質性群體身份 (a façade of homogenous group identity) (第8頁)。更重要的是，通過艾威富有同情心的注視，讀者可以深入瞭解為什麼在科學主義 (scientific realism) 成為主流範式的時候，一個古老的佛教傳統會贏得如此多的支持。歐陽竟無的真實佛教為一個受困於戰爭、殖民入侵和經濟崩潰的國家提供了一條精神道路。

其次，艾威的研究也是第一本認真對待中國法相唯識學的“中國性” (Chineseness) 的專著。與到目前為止用西方哲學的標準來衡量中

³ 關於英語世界中對於中觀哲學研究的偏見，有一個精闢分析，見以下重要著作：Andrew P.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āgārju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國法相唯識哲學的英語世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⁴，艾威的專著將歐陽竟無的思想牢牢地嵌入到一個本土的知識背景中，從他的考據訓練，到他對“不真實”(inauthentic)的佛教的批判，再到他在接近生命終點時嘗試融通儒釋的轉向。在某種程度上，英語學界研究佛教哲學的誤差是由割裂獨立的學科訓練造成的。佛教哲學的研究者往往首先接受西方哲學傳統的訓練，然後將他們的學術訓練應用於佛教文本。然而，要真正研究中國的法相唯識學，佛教哲學的學者必須更好地熟悉相關的中國哲學傳統。艾威的專著之所以能成為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正是因為他深入到了中國哲學、儒家思想和佛教哲學等多個領域，並將這些看似不相關的領域導入富有成效的對話。因此，這部專著對佛教研究、漢學和另類的現代性研究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

按主題組織，每一章都闡述了歐陽竟無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關鍵階段或圍繞歐陽竟無的理論創新的爭論⁵。第一章介紹了歐陽竟無在考據學和陸王學派(該學派源於宋代理學，以注重心性著稱)方面的背景，以及他轉向佛教的情況。透過個人生活，這一章揭示了導致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法相唯識學說的核心力量、關鍵人物和有影響力的機構。第二章至第四章描述了歐陽竟無在其早期職業生涯中的主

⁴ 幸運的是，佛教哲學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正在採取行動來修正這種歷史性的忽略。AAR 2021 小組“重溫佛法：被忽視的歷史和佛教哲學的可能未來”(Revisiting Dharma: Neglected Histories and Possible Future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超越了對英語學界的哲學和與個人有關問題的關注，而是將學術注意力轉向由邊緣化和受壓迫的社區領袖發起的現代佛教社會哲學的重建。(AV20-232, 11月20日星期六, 12:30-2:30)。

⁵ 關於每一章所涉及的哲學問題的更詳細、更精闢的總結，見李晶晶 (Jingjing Li) 的書評：Review of Aviv, Eyal, *Differentiating the Pearl from the Fish-Eye: Ouyang Jingwu and the Revival of Scholastic Buddhism*. H-Buddhism, H-Net Reviews. 2021年9月。網路鏈結(2022年10月18日登錄)：<https://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56914>。

要關注點。第二章集中討論了歐陽竟無對中國佛教傳統（如禪宗、天台宗和華嚴宗）中體現的各類反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 的批判。第三章研究了關於《大乘起信論》的爭論，其如來藏 (tathāgatagarbha) 理論是很多亞洲佛教宗派的基礎⁶。第4章將鏡頭對準歐陽竟無最有爭議的理論創新：唯識 - 法相，這為歐陽竟無“辨偽存真”的方法奠定了基礎。歐陽竟無曾激烈地指出，漢傳佛教長期以來的謬誤無異於“魚目混珠”，英文原著標題緣此而來。第5章追溯了歐陽竟無後來對儒家和佛教的調和。艾威認為，這種混合主義是受個人痛苦的驅使，而不是放棄了對“真實性”的追求。第六章回顧了歐陽竟無的學術運動的持久影響和當代意義。

艾威的專著對佛教研究的未來有著深遠的影響。首先，它展示了古老的教義如何以及為何仍在啟動像漢傳佛教這樣的傳統。因此，佛教研究者不應把佛教傳統當作記錄已逝的思想活動的“一紙具文” (textual corpse)，而應該關注這樣的問題：現代詮釋者如何以及為何不斷對佛教修行進行重新發明，從而對當代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其次，艾威的方法是對查理斯·哈里賽 (Charles Hallisey) 提出的“跨文化摹仿” (intercultural mimesis) 的呼應和延伸。哈里賽在對南亞現代佛教的研究中，強調跨越歐亞的多重仲介如何彼此互動而共同產生意義，這種互動受制於殖民權力差異，但同時構成對這種權力差異的解構和批判⁷。艾威將“跨文化摹仿”延伸到了中國的背景之

⁶ 為了更好地瞭解歷史上圍繞如來藏理論的爭議，特別是在其早期的印度和中國背景下，請看以下兩本最新專著。李子傑《『究竟一乘寶性論』と東アジア仏教——五—七世紀の如來藏・真如・種姓說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2020年)與 Christopher Jones, *The Buddhist Self: On Tathāgatagarbha and Ātm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0).

⁷ 1995年，查理斯·哈里賽首次提出了“跨文化模仿”的概念，以引起學者們對

中，並展示了像歐陽竟無這樣的歷史角色在塑造佛教現代主義作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方面的作用。我希望在艾威的專著中看到更多的是，不僅僅是歐陽竟無也在全國範圍內就緊迫的社會 - 政治 (socio-political) 問題進行辯論，而是對以下問題進行更精確的闡述：歐陽竟無的法相唯識學是如何以其“佛教哲學立場” (Buddhist philosophical stance) 改變論辯條件的？以及歐陽竟無的法相唯識學又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討論現代性、民族身份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和公平社會 (just society) 等問題的新詞彙？學者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將現代法相唯識學理解為一種徹底不同的過程社會哲學 (process social philosophy)，即社會事實是變動不居 (everchanging) 的，沒有永恆的實體 (without eternal essence)，萬法唯心 (mind-dependent)，並且是個具有偶然性的時空和合 (historically-locality-contingent) 的過程？他的新唯識和後來的儒佛合流如何動搖了“佛教”作為一種哲學、一種世界宗教、一個分析範疇 (analytic category) 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穩定性？

第三，同樣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更深入的方法論意義上的反思：如何認真對待一個相當陌生 (drastically foreign) 但同樣引人入勝的思想體系，如何避免將西方的“本體論假設” (ontological assumptions) 投射到其他複雜的思想傳統上，以及如何利用法相唯識學的“外來屬

僧侶精英在共同產生上座部佛教的現代詮釋中作用的關注。見：Charles Hallisey, “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the Study of Theravāda Buddhism,” in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1-61. 2020年《環球佛教期刊》(*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的“專題研討會：上座部研究的新路徑”(Symposium: New Roads in Theravada Studies)特刊之中的四篇論文，共同推動了該領域向前邁進了一步，並提出了超越“世俗化範式”(secularization paradigm)的多種途徑。考慮到東南亞漢語文化的影響，本人認為艾威的方法論對開闢佛教研究的新道路有很大貢獻。

性”(foreignness) 作為一種手段，撼動根深蒂固的文化假設如主客體的劃分，以及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anti-realism)，重新評估這些習見的二元對立？這些方法論的反思可以開啟關於跨越不同哲學系統的有關公正社會的對話。